

# 評介翁之鏞著「中國經濟問題探原」

陸 寶 千

「中國經濟問題探原」爲已故翁之鏞先生所著。全書共四十三節，分爲十二章，計三百八十二面。以篇幅言，不能稱爲鉅著，以內容言，頗多卓見，足稱一家之言。是書由臺灣正中書局在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出版，迄今已將三十年，尙未見人予以評介。茲將該書內容，略予撮述，俾能引起學界之注意。

據作者稱本書乃因討論中國之經濟政策而起。經濟政策乃對經濟問題而發，經濟問題必有其產生之背景，對此背景作一客觀分析，憑此分析，以求我國舊經濟基礎所依憑之環境，與其發展之流變，且推論今日所以未能適應時代要求之癥結。於是本書表面上爲討論中國經濟問題之背景，實則成爲討論中國歷史演變之作。

作者以爲秦漢以來二千餘年之歷史，有三大循環。其一爲土地與人口盈虛消長的治亂循環。蓋二千餘年中，一治一亂之起伏，雖受外患、藩鎮、外戚、宦官、女禍、權臣、黨鋸，與宗室等八大類型配搭之不同，而有每一時代不同之徵象，然其基本原因，乃在人口與土地關係之消長。當大亂之後地曠人稀，人心厭亂，太平之世可即。一旦太平，人齒日繁，土地生產漸漸不能供給人口所需，於是禍亂積漸隱伏，一遇其他因素，如八大類型徵象中二三種之演變糾結，則一發而不可收拾矣。

其二爲城鄉的物資交流循環。中國農村爲自給自足式之經濟，其基礎乃以鄉鎮爲樞紐之物質交流。農村以其農產品換取其農用及日用物資，城市以農用物資換取糧食與日用必需品，皆由鄉鎮爲其中介。鄉鎮負起以有易無之懋遷責任，自然而然發生一種適合當時需要之信用制度，此即鄉帳制度。農村需要者可先取用物資，而後清償其債務；鄉鎮供應者可先交貨記帳，而成債權。更由有無之互轉作用，而成信用周轉。此在自然經濟時代不能謂非適於時代之創作，與歐洲之物物交換制度同一作用，而其方式則略異。唯此種信用往返之距離，不能太遠；信用之對象又爲個人。有此信用周轉爲基礎，對小農典型之農業生產，發生穩定性作用；苟無天災人禍之侵襲，農民略可安渡歲月，確乎亦能貧而守志。典當與合會即賴此基礎，而後

才能發揮其濟急之效。

其三為土地、資本相互轉化的集散循環。在昔「有土」始能生財，農民由土地所生之財，除去生產成本外，每次所獲利潤已甚微薄，迨經相當歲月之克勤克儉，集腋成裘，如其不安於漫藏而欲予運用，又並無多大可信之投資去路，即使勉強有一安放所在，又不願冒倒債之險，於是祇有重新投資於土地。雖然土地亦時有水旱災荒，然此可視為人生不可倖免之年災月晦，其已付出代價之土地，則並非盜賊之所能刦，旱災水禍之所能毀，較諸其他投資遠為穩當。就財富與經濟環境而為投資者打算，走上財又重埋土於之路，實有富於安全保障之經濟意義。何況在重農思想下，社會傳統亦認為此路最合乎正義。唯投資去路既受限制而束縛於土地，而以諸子繼承制度及子孫未必盡能克肖，土地之集中時間並不甚長，分散後之土地再由其他勤儉積聚之農夫加以投資而集中。諺云：「積善之家，五世其昌」，故充其量一家之興衰，至多以五世為限，五世之年代短則百年，最長不會超過一百五十年而已。

在二千年之歲月中，此三大循環中乃以治亂循環為中心而變化，亦祇有治亂循環最不穩定，常有起伏，其他二大循環，除受治亂循環之影響，被動而局部發生變化外，從未自動突起波瀾。此種被動而變之情形，誠然常致生靈塗炭，廬舍為墟，但以生產技術與組織未起基本變化之故，祇要大亂敉平，不到二、三十年即可恢復常態。

然鴉片戰爭以後，機製紡織品與糧食之輸入，男耕女織之傳統經濟結構遭受破壞，向以鄉鎮為樞紐之物資交流，原可平衡而必須平衡者，至此由於內流之商品愈來愈多，而由內外流者則愈來愈少，由是發生交易逆差，迫使農村餘資為之挹注，大部分資金一直流向外洋，永不回頭，農村乃日漸枯竭，日益貧困。交流既失平衡，鄉鎮之地位亦漸成為洋貨之推銷寄棧，鄉帳信用日漸縮小，農業生產所需之周轉隨之逼窄，終至使此交流循環完全破壞，向來可以自給自足的農村社會，就此由動搖而步上崩潰之途。

在城鄉物資交流循環破壞過程中，由於資金之外流，土地與資本之轉化循環亦隨而衰落。

此二大循環之携手衰落，乃是內潰，愈變而愈嚴重。最近一世紀來，洪楊之變乃是治亂循環之表現，但未能建立新政權，反為舊統治者所鎮壓而消滅，實軼出於歷史之常例。歷史上向居主動變化之主力，反夷為被動而止之結局，乃由於其他二大循環所生之轉變而致。此一變局，可以說明是經濟潛力，憑藉另一方面力量（海

外)支持而發生之影響，積極作用雖在腐蝕經濟基礎，而消極作用卻能壓倒傳統政治之發展路線，另走並不正常之新方向，此一時代轉變之暗示，惜無人爲之覺察，百年悲劇，皆由此引起。

應付此一變化，首先應求經濟之近代化，然而國人囿於傳統思想而阻延近代化之進程。所謂傳統思想者，一爲經濟上之「求均」觀念。作者以爲孔子之經濟觀念爲利用厚生以求均足，由「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？」之語即可知之。求足而後求均，本是順乎情而合於理之見解，然漢代以後，經黃老思想之漬染，「足」之一義遭受輕視而專重於「均」之觀念。惟因看輕「足」，而專在「不患寡而患不均」上用工夫，忽略「厚生」而專在「不患貧而患不安」上打算盤，政府對於人民之經濟生活，乃祇有消極之態度，而無積極的政策。士大夫亦懷有「貧爲貴」之思想，「樂天知命」再加上「安土重遷」，由是喪失克服自然之創造力，缺乏應付現代經濟社會複雜環境之智能。

另一妨礙經濟近代化之傳統觀念爲「財用重於經濟」。作者以爲我國自古已經建立起書同文車同軌之統一帝國，且建基於農村自給自足之經濟基礎之上，又采用無爲而治之治道。經濟生活在靜態中生長，活動範圍局限於農村至鄉鎮、鄉鎮至城市之間，幅度狹小，往返不頻。自然經濟之穩定性很高，地方色彩自然濃厚。在此情形下，惟有財權爲統一政權之指針，蓋財權必須在支配全局時才能爲用也；因此財用觀念乃籠罩經濟思想，財政措施庖代經濟活動。此一思想深入人心者二千年之久，迨鴉片戰爭以後，對外貿易另入新階段，經濟活動之幅度加寬，往來之次數增多，貨幣之作用遠非昔比，然而傳統觀念始終未變，不但無以應付動態經濟之要求，更牽連波及於經濟以外之活動。

以上所述，爲本書之理論骨架，除此以外，勝義甚多，如對於交流循環破壞情形之分析，對士大夫地位轉變之討論等，不再轉述。

本書重要各章，皆有簡括結語，主要段落於書眉上皆有提示，有助於讀者對書中內容之了解。且措辭安雅，行文流暢，爲一般同類著作中所罕見。

然本人對此書之撮述介紹，並非卽係完全同意書中之意見。該書作者曾從事於財經方面之工作，本書又旨在爲中國之經濟問題作「探原」，故對於中國歷史演變之解釋，大體屬於「經濟決定論」。人口與土地之消長，爲生產與消費之協調問題，城鄉之物資交流，爲分配與交換之協調問題；土地與資本之轉化，爲投資之導引問題。過去二千年中，人口與土地之消長，表現爲政治上之治亂循環，而城鄉之

交流循環，土地、資本之轉化循環，俱未被破壞。換言之，政治有變而經濟基礎之重要部分不變，故歷史之進展，僅表現為治亂之反復，不能出現其他型態。鴉片戰爭以後，城鄉之交流循環首被破壞，土地與資本之轉化循環繼之，於是政治上之治亂循環，不能再返故轍，乃久亂而不治，本書之主旨如此。吾人以為經濟誠然是影響歷史演變之重要因素，然是否能絕對決定歷史演變之方向，則尚待討論。即以治亂循環論之，二千年中，生存空間大體不變，如果數萬萬之人口可以形成壓力而引起動亂，則人口在數千萬時何以亦能形成壓力？以土地與資本之轉化論之，亦並非二千年中之實情，宋代盛時、明代中葉，俱曾有大規模工商業之出現。以城鄉交流論之，中國鄉鎮之出現，在唐宋以後，並非漢代以來即有此循環也。不過大體而論，本書為國人解釋自己歷史的一家之言，雖問世已將三十年，尚有為吾人一讀之價值。